

农户可线上投保 北京农业保险承保电子化试点启动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震 李皓洁)5月9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保险行业协会获悉,北京地区将于2019年5月10日全面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全流程电子化改革试点,为北京广大农户提供便捷高效的农险承保服务。

此次农险承保电子化试点涵盖承保信息采集、标的查验、说明义务履行、承保公示、保单签发、保单批改的承保业务全流程。保险公司通过电子设备直接采集录入农户投保信息和资料,应用卫星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查验标的,使用短信链接和验证码方式履行保险条款说明义务,由全国农业保险信息管理平台CA认证、生成并发送与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电子保单。集体投保农户可以登录中国信保的农险在线公示系统确认、反馈分户承保公示信息。

对于农户来讲,电子投保优势明显,一是满足农户便捷投保需求。农险投保全流程电子化实施后,无需投保人与业务人员面对面订立合同,满足了农户便捷投保的需求;二是强化明确说明过程。在农险电子投保过程中,保险人以电子形式将保险条款、补贴政策、免责事项等信息展示给投保人,并供投保人阅读确认。

安华保险北分总经理黄洪伟表示,北京作为农险承保电子化的首个试点,参与试点的各家农险公司为此已准备了较长时间,公司相关上线系统和宣传工作都已准备就绪。

关于此次试点将对农户和保险公司带来哪些影响,黄洪伟表示,首先是投保手续变得简便,建立电子档案后续保也会更方便,其次,投保信息以电子化形式呈现,公司查阅起来更方便,还有就是此前进行投保公示时保险公司需要去村里进行张贴信息,如今只需要在线上公示即可,对于公司和农户都可以足不出户即可查看。

黄洪伟还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虽然农险承保全面电子化流程上线,不过由于农村投保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从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会是线上、线下承保同时运行,待线上平稳运行后,之后的投保或将主要集中在线上进行。

香港虚拟银行牌照再添4家 蚂蚁金服、腾讯、平安集团抢滩登陆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震 宋亦桐)香港虚拟银行牌照数量再扩容,5月9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香港金管局”)官网发布消息称,金融管理专员已经根据《银行业条例》向蚂蚁商家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贻丰有限公司、洞见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及平安壹账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壹账通银行”)授予银行牌照以经营虚拟银行,牌照于5月9日生效。至此,香港金管局的第8批8张虚拟银行牌照已全部下发完毕。

据悉,根据已经获发牌照银行的业务计划,上述4家公司的服务预期可于6-9个月内正式推出。香港金管局透露,发出上述银行牌照后,香港的持牌银行数目增至160家。

从股权结构来看,此次发布的4张虚拟银行牌照均有内地互联网及金融机构背景。其中,蚂蚁商家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为蚂蚁金服2018年8月16日在香港注册成立。贻丰有限公司为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高瓴资本联合香港商人郑志刚(通过其投资主体Perfect Ridge Limited)的合资公司。洞见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则为小米旗下引力金融科技的全资企业。平安壹账通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成员公司金融壹账通的全资子公司。

再加上3月27日香港金管局首次获批的3家公司Livi VB Limited、SC Digital Solutions Limited及众安虚拟金融有限公司,以及4月10日取得牌照的金融科技公司Welab Digital Limited,至此,香港金管局的第8批8张虚拟银行牌照已全部下发完毕,8家虚拟银行中7家有内地互联网及金融机构背景。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透露,目前正与8家获发牌的虚拟银行紧密跟进,让它们做好准备,按照计划开展业务。

在业务布局方面,腾讯集团表示,贻丰有限公司主要为现在未能受惠于传统金融体系的用户如小额存款用户提供服务,提供的服务包括不设最低账户结余要求、免收最低账户结余收费等。

首单股份行永续债即将落地 民生银行400亿资本债获批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震 吴限)首单股份制银行永续债获监管批准。5月9日,民生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于当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民生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批复,同意该行发行不超过4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并按照有关规定计入该行其他一级资本。上述事项尚需得到央行批准。

民生银行表示,将在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完毕后的一个月内有相关发行情况和资本充足率变化情况向银保监会提交正式书面报告。该行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财报,截至2019年3月末,民生银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14%、9.28%和9.06%,分别较年初提升了0.39个、0.12个和0.13个百分点。

据了解,继今年1月中国银行率先试水成功发行首单400亿元永续债后,包括工行、农行、中行、交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均披露了拟发行永续债计划。

4月新增信贷社融双双回落

在一季度新增信贷超预期增长下,4月金融数据表现也备受市场关注。5月9日,根据央行官网最新公布的2019年4月金融数据显示,当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人民币贷款均有所回落,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3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4080亿元。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2万亿元,同比少增1615亿元。在分析人士看来,今年在利率双轨并轨加速的情况下,利率和流动性传导机制变得更通畅,流动性边际上的收紧可能影响到了信贷市场,可能是导致社融和信贷规模增速回落的重要原因。

新增贷款同比回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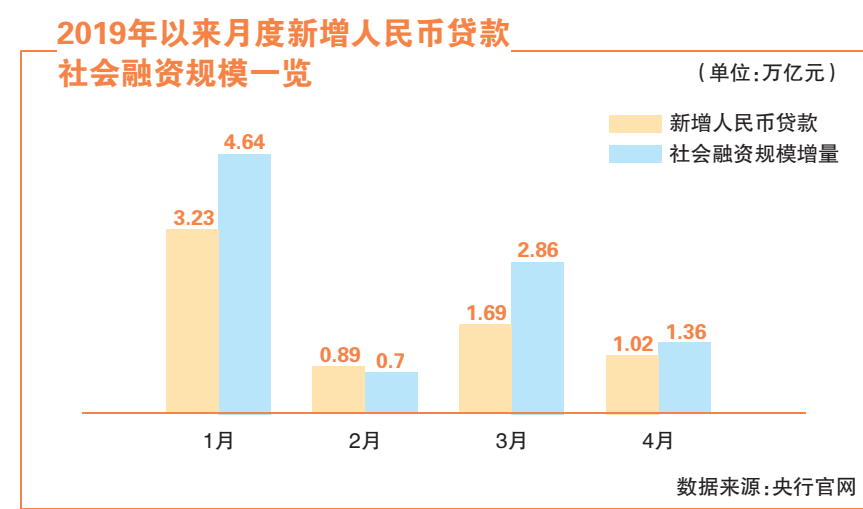
具体而言,在新增信贷方面,4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2万亿元,同比少增1615亿元。3月的这一指标为人民币贷款增加1.69万亿元。

分部门看,4月住户部门贷款增加525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09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165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3471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1417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823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874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417亿元。

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丽娟表示,随着一季度末冲存款等因素的消退,4月人民币贷款回落也属正常现象。但从另一方面看,近日公布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4月为50.2,较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经济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企业融资需求下降。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伊楠也认为,4月新增信贷同比减少主要是由于企业部门贷款大幅下降,反映出企业融资需求和银行部门风险偏好双双下滑。

在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看来,尽管今年1月央行实施了降准,看到一季度末公开市场却又持续暂停逆回购,1月降准之后,DR007下行,一季度一些时候银行体系流动性



过于宽松,加之一季度经济增长超预期,通胀水平有抬升的态势,央行似乎有意停止投放流动性甚至回笼资金,引导货币利率回到政策利率上方,以避免造成“流动性幻觉”和单边预期。

社融规模同比少增4080亿元

从社融增量来看,同样有所下滑。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3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4080亿元。3月的这一数据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8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28万亿元。

其中,4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8733亿元,同比少增2254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330亿元,同比多减304亿元;委托贷款减少1199亿元,同比少减282亿元;信托贷款增加129亿元,同比多增230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357亿元,同比多减1811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3574亿元,同比少391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1679亿元,同比多871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262亿元,同比少271亿元。

王丽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4月社融增量减少,主要是由于委托贷款、外币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规模缩减,同时,

地方政府债、人民币贷款增长环比也出现下滑。

在陶金看来,3月社融从总量和结构上都有明显改善,本身在4月存在回调的空间。从结构上看,除了信贷扩张放缓,居民中长期贷款增加同比减少,说明房地产需求仍较弱,票据融资增加较多,说明企业试图通过表外融资获得额外的融资,而相较于3月企业短期融资高增和中长期贷款低迷,4月趋势有所反转。不过总体而言,社融数据变化主要受流动性边际收紧传导到信贷市场上的扩张回调。另外,3月社融增速同比增加较多,去年4月社融增加较多的基数效应也影响了4月的社融数据回调。

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之所以看起来社融信贷增量缩水,是因为与一季度超预期的数据相比出现了季节性的减少。从稳定物价水平的角度看,一季度我国经济数据有本质好转,整体经济有平稳回升的良好态势,在此背景下信贷及社融规模不宜过分扩大,会导致物价水平有畸形的增长。在他看来,4月M2增速客观地匹配了我国GDP的增速水平,从两者比较来看,4月社融信贷增量是适度的。

M2增速微降

值得注意的是,广义货币(M2)增速环比也出现了下跌。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88.47万亿元,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末低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

这一指标在3月末的数据显示,广义货币(M2)余额188.94万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6个和0.4个百分点,创下2018年3月以来的最高增速。

关于M2增速环比下跌的原因,陶金表示,主要是因为一季度M2增速明显较大,同时3月M2同比增长8.6%,高于前值8%。在流动性边际收紧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环比下跌是合理的。一季度,机关团体存款环比增加的数量上大体冲抵了财政发力带来的财政存款减少,增速是超预期的。M2和社融未来将回归名义GDP增速,此次回调可视为政策层面的努力开始生效。

伊楠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尽管市场有所回暖,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仍然较弱,居民存款较多留在银行体系。受到缴税冲击以及表内外融资萎缩导致贷款派生存款能力下降等因素影响,企业存款减少1738亿元。在货币供给方面,受到企业存款减少影响,M1增速下滑至2.9%。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增加部分对冲企业和居民部门存款减少,减税政策降低财政存款增加对M2的拖累,M2增速微降8.5%,M1-M2的剪刀差扩大。而4月社融和信贷数据弱于去年同期和市场预期,也显示出稳健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

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看来,继上月信贷、社融放量增长之后,本月逐渐回归正常水平,增速基本合理,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的稳健中性基调并没有改变,未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量”的适度 and “价”的合理,仍是经济稳增长的关键。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震 吴限
实习记者 马婧

Special focus 重点关注

频现人事变动 多家银行高管“换血”

大中型商业银行管理层的调整仍在继续,5月8日,邮储银行发布公告称,银保监会核准张金良为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长。除邮储银行外,年内多家商业银行现人事调整热潮,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11位商业银行高管相继变动。虽然这一轮人事变动主要以年龄原因和工作调动为主,但同样也对银行的管理层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邮储银行董事长“落定”

邮储银行董事长任职消息终于“落定”。5月8日,邮储银行发布公告称,银保监会核准张金良为该行非执行董事及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张金良将同时担任该行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该行法定代表人将相应变更,自5月8日起生效。

2019年4月8日,邮储银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张金良为该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同日,董事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选举张金良担任该行董事长的议案。

公开资料显示,张金良是一位老银行人,曾在中国银行财会部工作多年。2003年10月至2016年1月,先后担任中国银行财会部副总经理、IT蓝图实施办公室主任、财务管理部总经理,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先后担任中国光大集团党委委员、执行董事,中国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行长。自2018年8月起,张金良任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2019年2月,邮储银行成功晋级为国有大行,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尚未在A股上市的国有大行。此前在邮储银行2018年度业绩发布会上,张金良曾表示,将积极推进邮储银行A股IPO工作,完成国有大行两地上市收官之作。

他指出,回归A股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治理体

系,建立资本补充长效机制,与其他银行相比,邮储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上市可以有效补充一级资本。据邮储银行2018年年报数据,截至2018年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77%、10.88%和13.76%,较2017年末分别上涨1.17个、1.21个和1.25个百分点。不过需要关注的是,董事长任职一事虽已尘埃落定,但邮储银行行长一职仍然虚位以待。

11位银行高管人事变动

近期,大中型银行管理层频频生变,与此前2016年“副行长”离职潮不同的是,这次多是董事长、银行行长人员发生变动。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今年已有11位银行高管相继变动。六大国有行中,包括邮储银行董事长、工商银行董事长、建设银行行长以及交通银行董事长在内的四家银行高管职位发生了变动。其他商业银行中,包括渤海银行行长、中信银行行长、招商银行副行长、平安银行副行长、江阴银行行长、盛京银行董事长以及还在上市辅导期的营口银行董事长职位均产生了变动。

银行高管离职后都去哪儿了?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与以往奔向互联网金融机构不同,今年的人事变动更多是在传统金融机构之间。例如,老银行人陈四清从中国银行离职后,填补了“宇宙行”工商银行董事长一职的空缺;交通银行原董事长彭纯出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3月20日,建设银行宣布,原行长王祖继因年龄原因退休,在当日披露的该行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中,确定了新任行长选为刘桂平。总结上述国有大行人事变动情况可以归结为,业务调整、组织决定、到龄退休。

股份制银行方面,据渤海银行官网近日发布的公告显示,付钢不再担任该行董事、行长职务。

据渤海银行此前发布的2018年年报显示,付钢的任期为2015年2月13日至2019年4月28日,中信银行执行董事、行长孙德顺也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执行董事、行长、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席、委员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

“国有银行领导的换届跟相关部门的换届有一定的联系,例如政府换届,在某一个环节上可能就会一同带动系统内银行领导的换届。所以会在某个阶段形成一个所谓的‘离职潮’。”首创证券研发部总经理王剑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同时在新一轮金融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需要进行新的战略布局,也需要在领导层上做一些调整。

管理目标转变

银行高管变动的最大特点是行内提拔、行内调动,虽然这一轮人事变动主要以年龄原因和工作调动为主,但同样也对银行的管理层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刘澄分析认为,商业银行的高管调整是必要的,但应该越来越专业化,调整节奏要稳定。另外,银行的高管调整应该立足于行业产生。最好是属于本行的资源,少量地从外面补充,大范围地进行轮换不利于银行的发展。

在金融科技的浪潮下,银行需要承担起走向科技化、数字化的使命,目前来看又需要怎样的管理模式?王剑辉进一步指出,在智能化、数字化的今天,银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做强做得更智能,而不是把规模继续做大,银行在未来的管理模式上应该朝着智能化、柔性化、减少层级的趋势发展。如何在不同领域运用科技手段,如何提供更多的差异化服务、差异化的经营策略是银行需要面对的主要课题。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震 宋亦桐